

山西史资料

第十五辑

山西人民出版社

山西文史资料

第十五辑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山西文史资料

第十五辑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井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frac{3}{8}$ 字数：215千字

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

书号：11088·58 定价：0.95元

目 录

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纪略·····	牛荫冠(1)
牺盟会的成立与晋察冀边区的创建·····	宋劭文(80)
牺盟会和决死二纵队成立前后的片断回忆·····	张文昂(98)
在牺盟会和决死队工作的片断回忆·····	梁膺庸(132)
关于山西抗日战争开始前后的几段回忆·····	杜任之(180)
决死四纵队在晋西事变中的反顽斗争·····	王黎生(213)
介休牺盟会的建立和武装斗争的回忆·····	李志敏(222)
抗日战争初期吉县地下工作和在晋东南 地区工作的回忆·····	张秀成(233)
军政训练班女生连的回忆·····	张梅华(277)
“一二·一八”惨案经过纪实·····	戎子和(286)
关于“一二·一八”惨案的几点补充·····	许红镨(290)
更正·····	(294)

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纪略

牛 荫 冠

一九三七年一月，我受北方局的指派，离开北平到太原，在薄一波同志的领导下，通过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这一群众性的统战组织和阎锡山搞统战工作。一开始，我在牺盟会太原市委主持工作，到一九三七年十月份左右，由于薄一波同志率领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赴晋东北、晋东南开展游击战和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我就调到牺盟总会参预了牺盟会的主要领导工作，直到一九三九年“晋西事变”（也叫“十二月政变”）后，由于统战工作遭到阎锡山的严重破坏，我才奉党的指示由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撤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在这三年多的时间内，我一直在牺盟会的领导机关工作，我一直在和以阎锡山为首的山西反动派的上层阶层打交道。现将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就记忆所及大略地介绍一下，供同志们参考。

牺盟会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经济上掠夺，政治上讹诈，军事上侵略，致使中华民族日趋危急的情况下；是在我党领导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推动下；是在山西广大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呼声中；尤其是在红军东渡的震撼与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是在阎锡山走投无路，不得不提出“守土抗战”、“牺牲救国”的口号以求“存在”的情况下，于一九三六年“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那一天正式宣布成立的。

一九三六年十月左右，薄一波同志接受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回到太原主持牺盟会工作以来，牺盟会就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活动了。牺盟会的政治主张，就是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和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中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了适应山西的具体情况，把党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要求贯彻在牺盟会的实际行动中，由薄一波同志主持，于一九三七年下半年根据我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精神，提出了一个适应于山西现实的《民族革命十大纲领》，来作为牺盟会的行动纲领。后经阎锡山批准，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公布后，也就成了全山西当局的抗日纲领了。这个纲领和我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原则上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在字句上和个别提法上有一些变化罢了。以致后来牺盟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一贯坚持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三大口号，也同样都是我党提出来的。在当时，牺盟会是根据抗日民族革命斗争的根本利益，根据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迫切心愿，根据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提出了“守土抗战（这是借用当时阎锡山提的口号）如愿取得最后胜利，必须不分任何派别，任何职业，任何阶级的男女，只要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都应该组织在我们的队伍中”的号召，得到了全省以及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和热烈欢迎。总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就是牺盟会的政治主张，而且就主持牺盟会工作的上下具体领导人来说，也几乎大都是共产党员。当然，从形式上看，牺盟会是阎锡山办的，甚至还有阎锡山的得力助手梁化之等人参与了牺盟会的领导工作，当时也喊了

一些“拥护阎司令长官抗战到底”之类的口号。但这都是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总原则出发和策略上考虑的，不这样做是不利于团结抗战和民族利益的。

从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在太原开始，直到一九三九年年底“晋西事变”时的秋林止，牺盟会总部和各区（牺盟中心区）县的中层和基层组织，都是在党中央、北方局、山西省委以及当地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各地虽然挂的都是“牺盟会”的牌子，但实际上都是共产党在各地的领导机构，只不过是用牺盟会这块牌子作掩护罢了。牺盟会的骨干，是吸收了全国各地（如山西、平、津、沪、四川、南京、武汉、东北等地）的抗日青年组成的。牺盟会是在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革命组织，是一支对抗日民族革命有重大贡献的重要力量。它用实践证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伟大的。

一、牺盟会产生的前前后后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揭开了大举侵略中国的序幕。由于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不抵抗主义，致使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东北三省之后，更变本加厉地进行侵略，由热河而长城各口，由长城各口而冀东察北，又由冀东察北而绥东晋北。一九三五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猖狂，“冀察政务委员会”、“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等汉奸傀儡政府相继组成，华北五省实际上已名存实亡。中华民族正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同时也直接威胁着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表抗日宣言，全国人民纷起响应，强烈要求抗日。工人、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不断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在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

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不仅广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坚决要求抗日，就连民族资产阶级、农村的富农和中小地主的政治态度也有了新的变化，国民党营垒中的爱国将领也纷纷要求对日作战。

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集团卖国成性，媚外残民，为了维持其独裁统治，继续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政策，妄图趁党中央和红军初到陕北立脚未稳之际，大举围剿。蒋介石自任“剿匪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以东北军为主力，配合陕甘宁其他国民党军队由西安向北进犯；同时又令阎锡山派晋绥军五个旅入陕窜扰，以形成南北夹攻之势。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毛主席并在十二月二十七日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讨论通过了毛主席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以实现我党对日直接作战的主张，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并在运动中进一步发展和扩大红军，彻底粉碎蒋介石、阎锡山对陕北苏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把中国革命推向新高潮。经过三个多月的东征，为了避免大规模的内战，我红军抗日先锋队主动回师陕北。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发表了红军要求南京政府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红军用回师河西的实际行动“向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在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并警告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

公的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通电振奋了全国民心，申张了民族正义，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引起了极大震动。尤其是对阎锡山来说震动更大。

当一九三六年五月红军回师陕北后，被阎锡山请来的蒋介石十个师却赖在山西不走，想借“剿共”之名把阎锡山一口吃掉。这对阎锡山来说，已成了他当前的最大威胁。他曾说：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了。

当时，摆在阎锡山面前的有三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继续顽固地联蒋“剿共”，一条是亲日反共，一条是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联共抗日”。究竟哪一条路对他的“存在”有利呢？经他再三考虑，还是从他的“存在就是真理”这一哲学原理出发，最后选定了“联共抗日”这一条路。就阎锡山本人来说，他虽然和日本人有勾结，但正当日本人野心勃勃“得陇望蜀”的时候，他想投敌卖国的这一桩买卖是不易达成的；同时，他心里也清楚，如果投靠日本，不仅保不住他在山西的政治统治和经济上的全部利益，反而会戴上汉奸的帽子，成为“千夫所指”的民族罪人。走这一条路风险太大，为时过早，当时他还下不了投靠日本的决心；如果联合蒋介石继续“剿共”，他也知道蒋介石想一箭双雕，但共产党的力量相当强大，红军东征时已领教过，他自感不是共产党的对手，而且又很不得人心。结果，不是被共产党把他撵出山西，就是被蒋介石借“剿共”之名一口把他吞掉，此路也不通；唯一可走的一条路就是“联共抗日”。这既可利用共产党的力量发动和组织起群众来抵抗日本人的侵犯，保存和发展他自己的实力，来作为和日军讨价还价的资本，以便为降日作好准备；同时也可以顶住蒋介石想一口吞掉他的阴谋。而且只要他答应抗日，共产党也不会对他再采取军事行动。他认为这是万全之

策，只有这样，他才能“存在”，而且还可发展。正如他当时所说：“现在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时候，就要看谁能制服谁了！”主意拿定之后，于是便在一九三六年的下半年提出了“守土抗战”、“牺牲救国”的口号，采取了一种与过去不同的“新政策”，即由“亲日反共”，一变而为“联共抗日”，由压制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一变而为抓取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权了。

这时，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号召和直接影响下，在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中，隐蔽在阎锡山政府机关和各社会团体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便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由杜任之等发出组织“抗日救国同盟会”的号召，后经阎锡山审定改为“牺牲救国同盟会”，并指定由梁化之召集杜任之、刘岱峰、宋劭文、戎子和、牛佩琮、张文昂、张隽轩、刘玉衡等人正式发出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但前期的这个“牺盟会”由于缺乏党的直接领导，有一些口号提得过激，引起了阎锡山领导集团内一伙反动军政官僚政客的反对，阎锡山也采取了抑制的态度，致使工作无法开展就停顿下来了。

当时，太原一方面存在着日本领事馆，挂着日本人的国旗，日本特务机关和阎锡山还明来暗去的勾搭。另一方面他又允许成立“牺盟会”这样的抗日组织，但他又不让提“抗日”，而只能提“抗敌”。阎锡山所以要这样做，就是从他的“二的哲学”观点出发，既要抗日，又要和日；既要联共，又要反共，联共抗日并不是他的真意，而是达到他自身“存在”的一种手段。关于这一点，我党和在牺盟会工作的同志心里是非常明白的。在那时，只要他有一点有利于抗战、有利于进步势力发展的表现，我们就要加以利用，并由此而发展壮大我们的力量。不这样，我们在

山西就无法立足。牺盟会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

牺盟会从总部到各级领导人中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就是在牺盟会领导下的各种组织中，共产党员也很多。这一点，阎锡山心里是清楚的，但在当时他想利用共产党来维护他的“存在”，不叫牺盟会中有共产党员是不可能的。而且在他看来，有共产党也是不可怕的。他玩牺盟会这张牌不是没经过考虑的，他自认为凭他老奸巨猾的多半生经验，是有办法来对付这些人的。但是在阎锡山上层集团中的旧军政人员，几乎都是反对牺盟会的。在阎锡山面前讲了许多牺盟会的坏话，甚至还在阎锡山面前造谣说什么“山西国民师范挂起了红旗”。意思是说牺盟会都是共产党。使我记忆较深的一次是阎锡山从阳方口退却下来以后，有一天半夜里，突然把我们几个牺盟会的领导人找去说：“现在我要革命了。日本人马上就要进攻山西和太原了。我库里还有一些枪枝，发一万枝给你们牺盟会。”阎锡山要发枪给牺盟会的消息一传出去，就引起了一些军阀、政客的竭力反对。结果减了一半，只给了五千枝。五千枝也好。我们除发给一些县区牺盟会游击队以外，太原牺盟会还留了一些搞训练用。阎锡山的首席中将法官张培梅就大发议论，说什么“这些小娃娃家也扛起枪来在街上乱跑，我要碰上，非杀他们不行……。”我们为了以防万一，上街的时候总是排着队走。如果他真的要抓、要杀那就麻烦了。从当时来看，上层集团中只有一个阎锡山的警卫旅长杜春沂好象对我们还表示友好。如薄右丞、邱仰濬，他们都是反对我们的。特别是薄右丞，他是坚决的反对派。

当时我们和阎锡山反动势力的斗争还是很激烈的，但是由于大势所趋，就连阎锡山也无法阻挡时代的潮流，别的人也只有叫嚷而已。

牺盟会从总部到各个委员会以及各中心区、县的负责人，绝大多数是在当地党委领导下的共产党员，可以说共产党和左派势力是掌握实权的。但是也夹杂着一些阎锡山的旧势力。在牺盟会内部，尤其是在刚成立的时候，斗争还是很复杂的。一九三七年太原撤退以前，就听到有一股谣言说什么“牺盟会是薄一波的”。这种谣言在当时是有一定的分裂作用和破坏性的。为了及时打击坏人从中离间，由薄一波同志主持在总部整整辩论了一上午。他曾在会上说：牺盟会是牺盟会的，怎么能说成是我的？来牺盟会工作的人大都是由别人介绍来的，又不是我委派的。比如牛荫冠就是由牛佩琮介绍来的，从前我根本不认识他。从内部来说，类似这样的明争暗斗还是有的。但占绝对优势的，还是以薄一波同志为首的一批严格遵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办事的共产党员。

“七七事变”前后，在太原工作的那一段时间，我们还和一些不利于统一战线工作的偏左的思想倾向作过不调和的斗争。比如，当时我们就坚决反对过这样一种论调：地主、资本家、绅士都是汉奸的源泉。汉奸的根源就是地主、资本家、绅士。如果把这一观点运用在实际工作中，就会迫使这些阶层的一些人本来不会当汉奸而走上汉奸的道路。这就实际上瓦解了我们的队伍而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组织汉奸的工作。这种左倾论调，实际上是破坏了统一战线的原则，不利于抗战的。

二、牺盟会在太原时期的组织活动

一九三六年秋后，薄一波同志接受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回到太原主持牺盟会工作后，组织名称虽然用的还是“牺牲救国同盟会”这个名称，但经过改组以后的牺盟会，从组织领导、人事配备、工作任务、活动范围，都与前期有很大的不同。

由于薄一波同志二次回太原时，经北方局决定又增派了杨献珍、韩钧、董天知、周仲英、王鹤峰、傅雨田、李力果、侯振亚、刘有光、廖鲁言、冯基平等十几个在白区工作有经验的党员骨干，牺盟会的工作很快就大刀阔斧、踏踏实实地开展起来了。但为了适应阎锡山在用人问题上的特点和便于开展工作，除以上同志外，北方局又挑选了一些山西籍的同志回到了太原。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原先在北京清华大学学习。曾在清华大学的党支部、西郊区委、北京市委组织部工作过。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李雪峰（当时他是我的党内直接领导）对我说：要挑选一些对山西情况熟悉一点的同志回山西工作，而且最好是山西人。因为阎锡山不信任外地人，而薄一波同志带回去的十多个同志又都不是山西本地人。所以这一次你也要回去。于是，我就和武新宇、梁寒冰等同志一起回到了太原。

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是市委书记安子文同志和我谈的话。由安写介绍信，我和薄一波同志接上组织关系后，他对我说：“你要自己找个职业。能到牺盟会工作更好，不到牺盟会去别的单位也可以。然后我再给你安排党的工作。”随即我便找到原来在清华大学的同学牛佩琮同志，由他介绍我到了牺盟会。这时，牺盟会的骨干就多起来了。如在山西本地参加牺盟会工作的宋劭文、戎子和、牛佩琮等同志，都是牺盟会的重要成员。

（一）改组后，太原时期牺盟会总部的领导成员是：

会长：阎锡山。

常委：薄一波、雷任民、冯基平、牛荫冠、宋劭文、傅雨田、梁化之等七人。

执行委员：张隽轩、杨贞吉、刘玉衡、刘岱峰、戎子和、郭挺一、梁膺庸、张文昂、董天知、周子贞、顾永田、李力果、杜春沂、

张干臣、徐宏文、王永和、智生元、薄右丞、楼化蓬等十九人。

阎锡山指定的牺盟会具体负责人是梁化之（反动政客、阎锡山的特务头子）和薄一波同志（实际负责人）。当时，牺盟会的负责人称为秘书。但对梁与薄都没有人这样称呼过。

在牺盟会总部下面，设有以下几个组织：

1. 组织训练委员会

组织训练委员会负责牺盟会的组织工作、干部训练和干部分配。组织训练委员会的负责人是李力果（已去世）。

主要干部有：

吕调元（牺牲）

雷任民（现任外贸部信托公司副主任）

楼化蓬（农业部顾问）

干事：

王仲义（原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监委书记）

亚苏（张晋媛，已去世）

在组织训练委员会工作的有二、三十人。

2. 宣传训练委员会

宣传训练委员会负责牺盟会的宣传工作。在委员会工作的大约有二、三十人。负责人是裴丽生（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主要干部有：

张稼夫（原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副主任）

侯振亚（原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已去世）

3. 太原市委员会

太原市委员会是在总部直接领导下的工作单位，它主要是负责太原市工人、学生和各阶层的组织发动工作。有时也和总部一起做一些内外上层人员的工作。负责人（秘书）牛荫冠（现任全

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市委委员有:

傅雨田 (现任江西省委书记)

梁膺庸 (原化工部副部长)

冯基平 (现在中共中央工作)

黎颖 (女, 原山西省妇联主席)

干事:

王耿仁 (当时负责党务工作, 已去世)

王世益 (王时青, 当时负责党务工作。原西安工交干校书记, 已去世)

赵辉 (女, 当时负责儿童团工作。现任粮食部副部长) 市委会下属五个区。各区负责人:

一区 张国声 (现任青海省委书记)

二区 顾永田 (牺牲)

三区 郭景伍

高晋才 (现任山西省水利厅厅长)

四区 牛荫冠 (兼)

王兴让 (原全国供销总社办公厅副主任)

五区 李涛 (现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4. 抗敌救亡先锋队 (简称“抗先”)

抗先队队长: 董天知 (牺牲)。在总队工作的有:

纪毓秀 (已去世)

凌则之 (牺牲)

陈永年 (牺牲)

王竟成 (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而死)

陈大东 (现任山西省外贸局局长)

陈颀学 (陈岱) 叶其瑾 (叶方, 原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副部

长)

5. 总务负责人是戎子和

(二) 太原时期在牺盟会领导下的各政治机构及其组织概况
军政训练委员会是培养军政干部的一个专设机构，成立于一九三六年八、九月。薄一波同志主持牺盟会工作以后，归牺盟会领导。会长是阎锡山，政治助理赵戴文，军事助理杨爱源。具体负责人梁化之、薄一波。军政训练委员会内设：

军训部部长 杜春沂（杜仙洲、已死）

政训部部长 梁化之（已死）

政训处主任干事 刘岱峰（原国家物资总局副主任）

组织部部长 薄一波（现任国务院副总理）

总务负责人 耿 誓（逃亡台湾）

军政训练委员会下设：

1. 军政训练班

军政训练班是军政训练委员会直属的训练军政干部的机构。最初有五个连队，后来扩充为十二个连队，其中有几个连队的学员较特殊。如六连和七连，学员都是被俘的红小鬼、政治犯和进步青年。十一连学员为女生。训练班指导员的来源分三个阶段：一九三六年八月至十月主要是由“自强救国同志会”派遣的阎锡山的政工人员担任；一九三六年十月至一九三七年四月，主要是由薄一波同志派的党员和靠近我党的进步青年担任；一九三七年八月以后，各连队原有的指导员大都调往国民军官教导团工作，指导员一职就从原来连队的干事中提升。曾在各连队担任过指导员的人，大约有：

一 连 杨贞吉 （阎锡山的特务头子，被我镇压）

二 连 童克明（已死）

- 三 连 崔道修（旧军官，被我镇压）
- 四 连 周新民（已死）
- 五 连 牛佩琮（现任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
韩 钧（原决死二纵队政治委员，已去世）
- 六 连 周仲英（现任国家纪委顾问）
杨献珍（现任中共中央党校顾问）
- 七 连 雷任民
戎子和（现任财政部顾问）
周仲英
- 八 连 张韶芳（原四川省副省长、中共中央西南局财办主任）
张汝俊（武汉大学）
- 九 连 谷景生（现在广州部队工作）
- 十 连 王鹤峰（现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
智力展（已去世）
周仲英
- 十一连 刘亚雄（原劳动部副部长）
- 十二连 韩 钧
廖鲁言（原农业部部长，已去世）

2. 民训干部团

民训干部团成立于一九三六年底，是专门训练民运干部的机构。总负责人是牛佩琮和张隽轩（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牛佩琮还兼政训主任。民训团共有七个队：

- 一队 指导员 张隽轩
政治工作员 刘有光（现任七机部副部长）
- 二队 指导员 牛佩琮